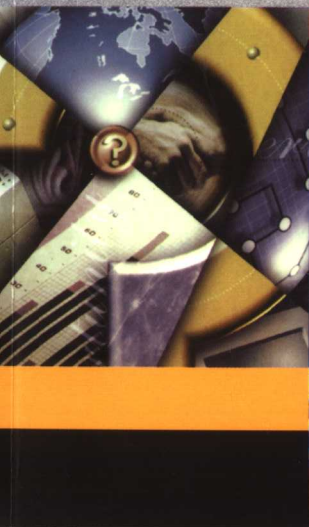


制度变迁中的 企业创新研究

ZHIDU BIANQIAN ZHONG DE
QIYE CHUANGXIN YANJIU

何 丰/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制度变迁中的 企业创新研究

何 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创新研究/何丰著. —上海: 上海
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1058-775-7

I. 制... II. 何... III. 企业管理-研究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749 号

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创新研究

何 丰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208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81058-775-7/D·066 定价: 13.50 元

目 录

引 言	1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
二、研究意义	5
三、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9
四、本书的创新之处	11
第一章 创新理论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脉络	13
第一节 创新理论的发端与兴起	13
一、马克思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思想	13
二、熊彼特对创新概念的界定	16
第二节 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	18
一、技术创新的内涵与外延	19
二、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	23
三、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选择	24
四、新技术的推广和扩散	25
五、技术创新过程的总结和划分	26
第三节 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	29
一、老制度学派对技术创新动力的分析	29
二、新制度主义对制度创新的强调	30
三、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	32
第四节 创新理论对我国企业创新的启示	33
一、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	33

二、改变过去重技术创新、轻制度创新的倾向	35
三、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构建技术创新的支持系统	35
第二章 企业内创新: 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	42
第一节 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技术创新	42
一、技术创新与企业制度的变迁	42
二、产权制度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	45
三、创新利润与企业家无形资产	48
四、经理激励制度与企业创新	50
第二节 组织结构变迁中的企业技术创新	53
一、企业组织结构的变迁	53
二、企业组织结构与创新激励的选择	60
三、技术创新与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新趋势	65
第三节 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	69
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总现状况分析	70
二、我国企业的组织创新	75
三、导致企业创新主体错位因素分析	75
四、加快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对策思考	77
五、强化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消除相关制度障碍	80
第三章 企业间创新: 创新网络的进化与治理	84
第一节 技术创新与网络组织的出现	84
一、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和企业制度的影响	84
二、知识经济条件下合作创新的必要性	87
三、合作创新的载体: 网络组织	88
四、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	91
第二节 企业创新网络的运行机制	93
一、企业创新网络的联结机制	93
二、企业创新网络的治理机制	95

三、信任是创新网络的基本运行机制	97
第三节 创新的外部性与创新网络的进化	99
一、创新的外部性	100
二、丰田公司的创新网络：对创新外部性的治理	102
三、区域创新网络：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	105
四、鲁尔区的创新网络：工业衰退区的案例	110
第四节 我国企业创新网络的现状和发展对策	113
一、我国企业创新网络现状的总体分析	113
二、我国企业的网络化建设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策	115
三、区域创新网络与中国科技园区的发展	122
四、工业衰退地区创新网络的构建	125
第四章 市场制度创新：企业创新的自发动力系统	128
第一节 市场制度变迁——从古典体制向现代体制的演进	128
一、经济增长的要素决定论	129
二、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	132
三、经济制度的变迁与经济增长	134
四、市场经济：从“古典体制”向“现代体制”的演进	136
第二节 企业创新与市场制度的动力系统	139
一、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动力系统	139
二、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构成	141
三、知识产权、技术创新成果交易与市场制度创新	143
四、我国技术交易市场现状和对策选择	149
第三节 市场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	153
一、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	154
二、不同市场结构中技术创新的实现机制	155
三、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市场结构调整	159
四、全球化竞争与产业结构知识化跨越	162
第四节 我国市场结构的制度成因和相关政策选择	166

一、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	166
二、影响我国企业创新的市场结构的制度成因	169
三、调整市场结构必须重视制度创新的对称与制度互补	172
第五章 政府职能创新：企业创新的催化系统	177
第一节 开放型市场经济变迁与政府职能创新	177
一、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变迁	178
二、开放条件下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必要性	181
三、开放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创新	182
第二节 开放条件下的政府行为与中国企业创新	184
一、动态比较优势对技术创新的贡献	185
二、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中国企业创新	187
三、开放条件下的企业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	190
四、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	193
第三节 国家创新系统与知识经济中的企业创新	196
一、国家创新系统的产生及其内涵	196
二、国家创新系统的功能及其构成	198
三、影响国家创新系统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政府职能创新	200
四、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国家创新系统	204
主要参考文献	209

引 言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在于创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这就是说,创新要遍及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我们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要全面推进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方面实现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创新,大力推进教育、科学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所有上述种种创新,都要落实到企业。企业的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社会各个方面创新的基础。研究企业创新,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基本概念的境界

(一) 企业创新的涵义

1912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并在《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中对其

创新理论进行了较为完善的阐述。熊彼特把创新界定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以获取潜在利润。熊彼特列举了五种创新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产品的一种新特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里,熊彼特所讲的“创新”,既涉及技术创新,又涉及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等,是一个广义上的企业创新。

本书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就是在熊彼特创新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但与他有所不同的是,首先,本书强调任何企业创新都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活动,创新的成败是包括制度因素在内的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定的制度安排。这在客观上要求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推动创新思想和各种相关资源的结合,达到高效配置创新资源、完成高水平创新的目的。其次,在现代技术经济条件下,企业创新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组织方式和活动范围,从单一组织的内部走向社会。这种多组织与网络化的新特征,使技术创新更体现为一种“跨组织”的社会过程。创新过程不仅涉及到企业本身,而且还与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二) 制度变迁的涵义

马克思认为,对制度的研究,首先要分析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在解释制度的起源时,马克思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在对制度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

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对制度的解释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严整逻辑的理论体系^[1]。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所谓制度变迁,实质是制度替代、转换和交易的过程。诺斯认为,“变迁”一词就是指制度的创立、变更及随时间的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就是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诺斯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取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但变迁的发生还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人(企业或政府)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就是在一个局部均衡带动下的制度扩散的过程;制度变迁又可以理解为制度的交易过程,制度交易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交易成本;制度变迁还可以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安排的创新过程。与制度变迁过程内在相关的是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主体通过创建新的制度安排获得追加利益的活动。”^[2]制度创新表现为:一种特定组织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规则的变化。当这些变化与创新收益具有实际相关的联系时,就可以从制度创新的角度上加以理解。

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即“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3]。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源包括:科学知识存量的增加提高了人们对新制度的创新能力;科学技术的创新影响制度结构;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长期变动导致主体利益的变化;制度结构要素的变迁对另一制度服务有需求等等。另一种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即由政府法律、法规以及各项政策导入所推动的制度变迁,如统治者的偏好,如果有利于统治者高收益的追求,统治者

就会推行新的制度安排以强化激励。制度变迁的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构建,产权制度安排的实质是构建一套具有“排他性”意义的制度操作系统,其目的是明确界定产权利益的归属关系,其现实效果是克服“搭便车”和避免“道德风险”,提高经济实体的投入产出效率。产权制度的界定同时要求相应的实施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以确保产权制度的有效性。总之,制度变迁的实现,表现为从起点模式向终点模式的替代、转换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制度主体的创新行为来实现的。“制度(供给不足)——创新(新方案的选择)——国家(实施机构)——意识形态(价值调控)”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变迁过程的研究构架。

(三) 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创新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引起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也构成了本书分析企业创新的社会背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政府的调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对改革过程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组织、协调,自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减少改革的阻力;可以解决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防止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控;可以按照社会理性的要求选择比较有利的制度模式和改革路线,尽可能少走弯路,从而弥补局部改革的不足;可以将群众自发创造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制度变迁有组织地推广到全国。

技术创新是高投入与高风险并存的经济活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和科研院所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才能承担技术创新主体的职能。大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市场和金融机构等是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支持系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必然带来政府职能的转变,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将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而是要求政府的作用要体现在为企业创新构

筑良好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法律环境和基础设施,并通过多种形式来影响和激励企业创新。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政府在技术创新中应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制定技术创新总体发展战略,领导、协调、监督和管理重要的技术创新活动,充分利用政府职能鼓励技术创新活动,营造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以及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高效的服务。

二、研究意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为战略目标的,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的本质在于制度创新,后一个转变的核心是技术创新。事实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技术创新的体制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先后推出了多项政策措施和科教兴国战略,鼓励技术引进与技术改造,逐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明确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大了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和推动力度。但是,由于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技术创新的研究与实践,起步晚,时间短,在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上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造成企业技术创新还不能得到制度创新的有效激励与支持。

从理论研究来看,自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后,技术创新作为创新理论的一大重要分支,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开发性研究、70年代至80年代的系统研究和80年代至今的综合研究几个阶段。战后以曼斯菲尔德、卡曼、施瓦茨、戴维、列文、格里列希斯等为代表的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的概念、过程、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开创性工作,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进入70年代以后,除熊彼特学派外,还有费里曼、多西、厄特贝格等人,对技术创新的理论基础、起源、过程、机制、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对技术创新的多视角、多层次探讨的局面,基本理顺了技

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整体框架。西方创新理论被引入我国后,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在引入和评析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如傅家骥、柳卸林、姜彦福、王春法、高建、杨武、刘满强、李正风、曾国屏、纪玉山等。他们在西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实践,对技术创新的概念、机制、过程、管理及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一般性研究已经越来越深入,但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的分析还较为分散,特别是国内过去的不少研究往往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割裂开来。虽然李正风、曾国屏、王大洲、王春法、张刚、李玉虹等学者在近年来开始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并取得了部分学术成果,但还较为分散,缺乏结合我国企业实际运作情况的深入研究。

从实践运作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国民经济素质和推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是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而企业要想获得持久的竞争力,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优化企业资源组合,使自己创造的产品、工艺或品牌不易被人模仿。可是,目前我国企业中真正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却为数很少,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中普遍存在着“三低两高两差”的缺陷,即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生产率低、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原材料消耗高、能源消耗高;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差。工业增长和企业发展方式基本属于粗放型。产生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产业及企业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太低,小于 30%,低于发展中国家 35% 的平均水平,更远远落后于 60%~80% 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我国企业的现行经营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是多年计划体制的产物或变种,存在着许多致命的缺陷,阻碍着企业技术创新实力的增强。其突出表现有:企业发展的方式主要靠国家投资,靠引进生产线,产品大多依靠仿制和引进技术进行生产,产品更新周期长,难以进行国际竞争。另外,长期以来,重生产和生产线的革新,轻产品开发和销售,即使近些年开始有所改变,仍然难以形成独立、完整的技术创新管理和销售管理体系。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生产销售被看作是不同部门

的事,资源分散,形不成强大合力。企业经营者有短期行为,缺乏长期战略规划。

我国企业不仅技术创新力量薄弱,而且在技术引进方面还存在普遍的失误现象。比如,许多企业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引进外资、外来产品、外来技术来开展生产经营,发展壮大自身。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导致企业自有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品牌技术创新等核心竞争能力的下降。因为外方感兴趣、愿投资的领域,多数是市场营利大的短、平、快项目,而不是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有助于企业长期发展、竞争力增强的项目。看一个企业经营好坏并不在于它的产品数量和一段时间的销售好坏,关键是看产品的科技含量、创新程度和工艺创新水平。技术的引进和模仿只能算是技术创新的起点。因此,企业若长此以往,就会削弱甚至丧失在市场上独立生存的核心能力,蜕变成其他企业的附庸。又比如,所有的企业已充分意识到,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自己产品能否占有市场的关键。于是在实践中,企业纷纷转向市场正看好的产品,大上短、平、快项目,轻视技术创新,未能把市场和技术结合起来,挖掘市场需求,未能用技术创新将这种需求转化为更佳的商品。结果造成许多企业在若干当红产品上重复投资、大量生产,市场上很快供过于求,价格下降,竞争激烈,大家都无稳定的市场。

作为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核心,我国企业的研究与开发(R&D)活动还很薄弱,不够广泛且行业分布不均匀,技术创新仍处于较低水平。我国企业创新中的技术获取主要靠外部来源,大型企业的重要技术来源是国外技术,中小企业的重要技术来源是省外技术或港、澳、台技术,企业自主研发技术的比重明显偏低。在技术获取方式上,普遍以引进新技术、新工艺,购买成套设备、关键设备以及技术培训等方式为主,较少采取购买发明使用权和专利的方式。许多企业在技术获取中还面临资金缺乏、进口限制和技术信息不足的困难。企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水平偏低,创新人才缺乏,职工文化素质不高,企业负担沉重,技术创新投入费用比重偏低,支出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投资比重大,R&D投入比重小),制度创新滞后等因素,也进一步削弱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与能力。

2000年8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2000·中国企业经营问卷跟踪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经营者比较重视企业创新工作,把创新视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学历高、年纪轻的经营者风险意识较强,更有创新精神;企业经营者普遍对高新技术的发展持积极乐观态度,技术创新方式逐渐步入以国内自主开发为主的道路;企业管理组织形式呈现多元化趋势,管理技术与手段的信息化程度日趋提高;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和股权制的企业比重在增加,企业经营者的收入逐年增长。调查结果同时表明,虽然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但总体创新水平还不高;许多经营者感到观念创新难度较大;管理组织形式的创新相对滞后,技术创新人才缺乏;现行企业经营者的任用制度与经营者的期望尚有较大差距;政企职责不分和产权改革滞后仍是制度创新中的主要障碍。为此,企业经营者希望全社会培育和倡导创新文化,进一步强化创新意识,建立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突破制度创新瓶颈,加大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力度,切实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迎接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4]。

正是在以上背景之下,本书将“制度变迁中的企业创新研究”作为研究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创新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充分整合和深入分析,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以期较好地指导我国企业创新的路径选择和系统支撑。本书从企业、市场、政府的不同角度出发,从企业内部、企业外部和企业之间三个层面着手,构建起企业创新研究的分析框架。在企业内部层面,创新是企业制度、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制度激励的主体是企业,客体是企业员工,特别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企业外部层面的激励包括市场制度激励、政府政策激励,激励的主体是市场和政府,客体是企业;企业之间创新,则是以创新网络为载体,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和信息、通讯等技术创新的兴起,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网络组织。创新网络中的各独立企业彼此信息共享、长期合作,灵活充分地运用企业外部的资源优势。在由内而外、多层次的激励制度框架中,本书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现状和

技术创新激励制度的现状和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完善制度环境的相应对策。因此,本书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互动关系的基本架构,探讨在微观层面形成完善的技术创新制度动力系统,在宏观层面营造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支持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创新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科学成分,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和创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力求避免抽象而空洞的概念演绎。全书分两大部分,包括引言和正文五章。

第一部分为基础理论的梳理和简要评论。包括引言和第一章。在引言中介绍了本书的研究意义、基本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以及本书的创新之处。第一章阐述创新理论的思想来源和发展脉络。首先介绍了创新理论的发端与兴起,评述并比较了马克思和熊彼特对创新理论的研究视角和学术贡献;然后对创新理论的两大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的各自观点、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最后在评述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之争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过去重技术创新、轻制度创新的倾向,提出以企业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构建技术创新的支持系统。

第二部分为本书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五章的全部内容。

第二章为“企业内创新: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与技术创新”。本章通过回顾技术创新与企业制度变迁的互动演进历史,提出由于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必须加强企业制度建设,从企业产权制度激励、组织制度激励等不同角度,架构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激励制度体系,在企业内部形成相对完善的技术创新制度动力系统。

第三章为“企业间创新:创新网络的进化与治理”。本章在总结技

术创新与近现代工业演进历史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通讯等技术的创新引发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在知识经济的冲击下,企业创新更加注重发展企业间的合作网络,以充分利用本企业外部的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态——企业网络组织。企业创新网络的联结机制、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充分体现了知识经济浪潮中企业合作创新的新特点。由于网络效应和创新外部性的存在,使企业创新网络呈现空间集聚特征。本章通过丰田公司的外包网络和鲁尔区在工业衰退区重建创新网络的案例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网络化建设和加速中国科技园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四章为“市场制度创新:企业创新的自发动动力系统”。由于市场制度是一种实施费用低、效率高的激励制度,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市场的内生机制,可以使企业迫于竞争压力,开展主动创新,并减少创新的盲目性。本章在分析市场制度变迁及其动力系统构成的基础上,重点对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交易和鼓励、规范企业竞争的市场制度进行分析,探讨通过市场制度创新,激励我国企业进行持久活跃的技术创新。

第五章为“政府职能创新:企业创新的催化系统”。由于技术创新具有“准公共品”的特点,仅靠市场制度对企业创新进行激励,会出现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国际竞争力下降等问题,因此要加快技术创新的进程,除了依靠市场制度的激励外,还需要借助政府行为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政策面的导向和支持。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方面,如果没有一个明智政府的积极促进,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政府干预过多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讨论政府的经济职能时,既要认识到政府的经济职能所在,又要能够将政府作用界定在适当的范围内。本章在分析开放型市场经济变迁过程以及政府主导经济转轨必要性的基础上,重点对开放条件下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进行分析,探讨通过政府职能创新和构筑国家创新系统,激励我国企业创新的对策选择。